

THEORY

EAGLETON

马海良 著

文化政治美学

——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

CULTURAL-POLITICAL AESTHETICS
——A STUDY ON THE EAGLETONIAN
CRITICAL THEOR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ORY

EAGLETON

马海良 著

文化政治美学

——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

CULTURAL POLITICAL AESTHETICS
——A STUDY ON THE EAGLETONIAN
CRITICAL THEOR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马海良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1

ISBN 7-5004-4804-X

I. 文... II. 马... III. 美学理论—研究 IV. 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6234 号

责任编辑 汪民安

特约编辑 宋凌云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任菊华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

插 页 2

字 数 190 千字

定 价 1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1	总论	(1)
1.1	希望之旅：学术和思想历程	(1)
1.2	伊格尔顿的贡献	(11)
1.3	伊格尔顿风格	(29)
1.4	伊格尔顿研究	(40)
2	批评的功能	(46)
2.1	批评的政治性	(47)
2.2	批评或修辞学	(56)
2.3	从文学理论到文化理论	(65)
2.4	革命批评	(73)
3	生产方式和文化生产	(82)
3.1	多重结构的生产方式	(83)
3.2	生产方式的文本印记	(90)
3.3	“文学”的建构性	(99)
3.4	文化生产	(108)

2 文化政治美学

4	意识形态批判	(118)
4.1	意识形态面面观	(120)
4.2	话语和政治权力	(130)
4.3	艺术与意识形态	(139)
4.4	美学的意识形态	(147)
5	文本科学	(154)
5.1	文本的边界	(157)
5.2	文本生产	(164)
5.3	一种文本性	(170)
5.4	文本的价值与阅读	(178)
6	穿越后现代主义	(188)
6.1	后现代主义幻象	(190)
6.2	后结构主义因素	(199)
6.3	重估“总体性”	(215)
6.4	反讽的历史	(225)
	文献和参考书目	(235)
	后记	(249)

1 总 论

对于大部分读者而言，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在西方，他的《文学理论引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直是文学专业学生的首选文论教材。当代西方文学研究者们也经常引用伊格尔顿，似乎他的语录总能在关键时刻提供某种权威的支持。在中国，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早在1980年就有了汉语译本，是中国开放后最早译介的西方文论著作之一。然而到底什么是“伊格尔顿批评理论”，其特征标记和概念体系是什么，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恐怕还没有一个现成的答案。本书尝试解答这些问题。

1.1 希望之旅：学术和思想历程

1964年，21岁的伊格尔顿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同时在老师雷蒙·威廉斯的直接指导下开始其学术生涯。^①威廉斯于1958年出版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一

^① 伊格尔顿于1943年2月22日生于英国曼彻斯特北部沙福德小镇的一

书后来被视为“文化唯物主义”的奠基石，当时产生了惊世骇俗的效果。I. R. 瑞恰兹和 F. R. 利维斯等人悉心经营多年的“细察”批评已经雄踞英国批评领域，一种全力守卫文学本身的“有机性”的“伟大的传统”似乎已经深入人心，尤其是瑞恰兹和利维斯设坛授业的剑桥，更是难以想像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会冒出一条“文化与社会”的文学批评歧路。因此尽管文学与文化、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历史等文学的“外部因素”联系起来，在英国早已不是新生事物，马修·阿诺德的“人生批评”根基甚深，而马克思主义批评在英国也一直有广大的读者，但是从英国批评主流的角度看，从剑桥英文系的研究传统看，雷蒙·威廉斯实在是书写了不平凡的一页。简言之，《文化与社会》的基本立场是，文学批评向来就不是纯文学的事情，而是与社会文化各部门密切联系、无法单独分离出来的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文化（社会）生活的不平等状况更加严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努力被冷漠而顽固地排斥在“文化”之外，为了消除由此产生的社会裂痕，必须呼吁一种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参与建设、控制和享有的“共同文化”。不难看出，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不仅试图将文学文化与物质文化关联起来，而且表露出温和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倾向。

个爱尔兰工人移民家庭，1964年入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求学，于1964年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在基督学院做研究和教学辅助工作。1969年至1989年，在英国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任诗歌辅导员；1989年至1992年任牛津大学里纳克学院批评理论讲师；1992年至2001年任牛津大学沃顿英国文学教授。2001年至今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任文化理论教授。

伊格尔顿于1967年出版的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莎士比亚与社会》，尽管也使用了存在主义和利维斯主义的术语，但他主要采用了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框架，探讨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自由与限制等范畴的辩证统一问题，该书扉页上明确表示，这本习作式的专著是献给“威廉斯老师”的。属于这一阶段的主要著作还有《放逐与侨居：现代文学研究》（1970），《作为语言的身体：新左派‘神学’提纲》（1970）和《权力的神话：关于勃朗特姐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1975）等。如果将他此前发表的著作考虑在内，譬如《新左派教会》（1966）和《马克思主义与批评》（1967）等，那么可以看出，伊格尔顿在“文化与社会”框架内展开的工作带着明显的个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天主教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更加鲜明的社会主义立场。如果说威廉斯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是一种人本主义情怀的话，伊格尔顿的社会主义则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改造现实秩序的政治要求，例如主张扩大民主和社群生活，正如威廉斯的语言沉着克制，行文细密而周全，而伊格尔顿的语言则时时爆发出政治的激情。这个阶段的伊格尔顿在天主教神学、马克思主义和文学的交叉路口寻找自己的路线，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前马克思主义阶段，但是对于他的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而言，不能说这只是一个预备期。这个阶段的工作表明，他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文化政治批评的路径，可以概括为：第一，从威廉斯建立的问题框架开始，上承英国批评的“文化”语汇，表现出英国批评重视“文化”联系的传统特色；第二，注重批评实践，文学文本研究为他日后的理论探索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个案和实证经验，使其理论命题得到批评实践的最大程度的支持；第三，这一阶段的

许多论题成为他后来反复探究的内容，例如英国传统的“文化”概念以及“英文研究”传统，而且与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承续、反拨、批判和对话关系在这一时期初露端倪。此外，论战文体已经凸显出来，成为伊格尔顿风格的主要标记。

1976年，伊格尔顿出版了《批评与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两部重要著作，震动了英国学术界，震动之强烈，远在当年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之上。《批评与意识形态》对老师威廉斯进行了毫不留情的猛烈批判，指责威廉斯的认识论是唯心主义的，方法论是经验主义的，美学理论是有机主义的，政治观念是改良主义的，因此威廉斯顶多是个左倾利维斯主义者。

风云突变，理论转向，这是为什么？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影响大，就在于它是一场全球规模的学生造反运动。但是对于伊格尔顿经常抱怨保守封闭的英伦岛来说，那场革命的真正影响似乎是进入70年代之后才开始登陆的，因此他也是到了那时，才作出了学生造反派的举动。按照他后来的解说，70年代前后，从北爱尔兰到越南、从非洲到拉丁美洲的反帝运动如火如荼，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人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变自身生存状况的斗争风起云涌。面对这一系列历史事件，左派改良主义或第一代新左派显得无能为力，激进思想家们迫切需要理论上的更新，以解释新现象，解决新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尔图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著作进入英国，为新一代左派知识分子提供了理论阐释的另一种可能性。他们热情回应阿尔图塞，在对岸思想家的启发下，重新“阅读马克思”，形成70年代中

期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繁荣”。阿尔图塞思想的主题是剔除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各种“非科学”因素，倡导反人本主义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力图让马克思主义永远屹立在客观科学真理的基石之上。尤其是阿尔图塞关于多元决定、意识形态在主体构成中的作用以及科学理论的实践功能的论述，似乎能够让英国左派知识分子一方面比上一代新左派的人本马克思主义更有力地批判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另一方面又能摆脱自由人本主义、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新的理论资源和问题框架是伊格尔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开篇伊始就猛批威廉斯的“社会主义人本主义”的根本原因，阿尔图塞思想仿佛为伊格尔顿打开了新的理论天地，为这位决意要挑战和批判英国学术传统的年轻批评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应该特别指出，《批评与意识形态》的重点不在批判，而在建构唯物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范畴。在一般读者的印象里，伊格尔顿是一个论战批判型的批评家，少有理论建构方面的系统阐述。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在结构马克思主义时期的理论探索显得特别突出和重要。伊格尔顿在书中探讨了社会的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和一般意识形态对作者意识形态以及审美意识形态的决定关系，认为文学作品的直接依托不是历史，而是意识形态，因此文本不是历史现实的“反映”，而是各种意识形态互相作用的动态生产过程。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任务是探讨作家的意识形态与其他各种意识形态的互动作用，分析作家提出的对历史冲突的意识形态解决方案，从而揭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构成情况，而不是进行历史还原。他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范畴，尝试建立“文

本科学”，兼顾审美和历史、文本和语境并消除形式与内容传统二分法引起的阐释难题。这是伊格尔顿批评理论发展过程中最具有“理论”意味和系统思辨的学术色彩的阶段，也是他正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主要阶段。

在伊格尔顿的学术和思想历程中，1981年是又一个重要时间。这一年出版的《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对自己的思想作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决定用本雅明取代阿尔图塞，用“政治实践”取代“理论实践”，提出“客观真理是否可以归之于人类思想的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①他从本雅明的历史哲学和关于德国悲苦剧的研究中得到启发，提出激进批评应该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无拘无束地占用一切现成的文化文本，将它们大胆打破、撕碎、融化、改写、重写，实行最彻底的“读者阶级”的革命。他还向布莱希特和巴赫金借用“幽默”、“喜剧”、“狂欢”等概念，主张马克思主义批评应该成为一种创造性的话语实践活动，成为人民的文化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接着问世的《克拉丽莎被强暴》(1982)就是这一批评方法的实际演示。他结合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生动地分析了塞缪尔·理查逊的作品所表现的各种内在矛盾：克拉丽莎一方面激起拉夫莱斯的欲望，另一方面却代表着律法和父权，阻止拉夫莱斯的企图；克拉丽莎为资产阶级理想婚姻的“真理”而坚守贞操，而父权制却无法容忍女性的这种自我封闭；克拉丽莎之

^①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页。

死是一种政治行为，因为统治阶级的两翼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通过她的死而找到了互相结合的道德理由。

《文学理论引论》(1983)和《批评的功能》(1984)等重要著作，进一步从理论思辨向政治实践、从文学批评向文化理论转移。《文学理论引论》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主要流派作了精辟的简介和“概论”，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文学”概念和“英文研究”(the study of English)传统所作的深刻的社会政治剖析和对理论研究史中意识形态主导作用的揭示；该书最后直接提出了“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批评”的命题。在《批评的功能》里，伊格尔顿进一步强调批评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作用，通过对英国现代批评史的回顾，发现“批评”一开始就是“文化的”和“政治的”，是反对专制政权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重要组成部分。18世纪初，资产阶级随着自身经济主体地位的日益确立，提出了成为话语主体的政治要求，“舆论”圈子从贵族沙龙转移到咖啡馆和俱乐部，每一个判断都应该“直接”交给公众意见去裁定，“批评”因此也成了资产阶级反对专制政权和等级制度，争取政治独立的重要工具。《批评的功能》最后指出，当代批评的功能依然是它的传统功能，即政治批判功能，只是现在的批判对象变了：“现代批评是在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产生的，除非现在把它的未来确定为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否则它可能毫无前途。”^①这一系列著作集中反映了伊格尔顿将马克思主义传统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结合起来的努

^① 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from the Spectator to Post-Structuralism*, Verso, 1984, p. 124.

力，其动机和结果都是更加突出了其批评方法的“文化政治”特征。

这一阶段的伊格尔顿似乎表现出“转向”或“回归”的特征，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之交，他更是多次表达了向威廉斯道歉的意思，对卢卡契思想也给予了更多的肯定。然而严格地说，“转向”或“回归”这样的词语很难准确说明伊格尔顿的实际情况，因为他在70年代进行的“文本科学”工作，其动机也是为了提高学术活动的政治效果，增强文学批评干预实际社会生活的能力，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批评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以来包括威廉斯在内的左派批评家留恋自由人本主义、民粹主义和渐进改良主义政治，而他自己在阿尔图塞潮流下进行的唯物主义文学理论建构工作，总是结合着具体的文化政治批评实践；即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这部最具理论色彩的著作中，真正比较系统的理论阐述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对英国批评史和作家作品的具体批评占了相当的篇幅。因此，他在80年代的“转向”或“回归”与前一阶段注重政治实践的学术追求实际上是一致的，不存在断裂或改变基本立场的问题，顶多是阶段性的重点调整问题。

经过这一阶段的调整，伊格尔顿的文化政治批评方法显得更加明确和完善，概括而言：（1）这种方法坚持文学批评的大视野，文学是各层面互相关联、互相阐发的整个文化构成中的一部分；对文学作品的充分阐释必然将文本外的东西包括进来，只有在作品各层次及其与社会生活各部门的复杂关系中才能实现。（2）文化的复杂关系结构表现为一种“生产”关系或物质关系，即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决定因素是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经济关系集中表现为政治权

力的结构形式，因此“文化”不是超验的可以任意漂浮的能指，而是与我们的日常感觉紧紧联系着的实在问题，是现实政治问题；文化范畴仍然是利益和权力激烈斗争的场所，是矛盾和问题本身，而不是消除问题的办法；文化政治批评不是用文化来解释一切，而是用一切来解释文化。(3) 文化的“生产”关系性质还意味着，作为更为精神性的或所谓“情感结构”或意义象征系统或价值体系或意识形态，它对文化的其他层面发生积极作用，是一种维持或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的文化“活动”，是一种执行或实现意志的话语“实践”。(4) “文化政治”批评的动机是改造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使人的所有潜能得到自由的发挥，这样的社会只能是取代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社会。(5) 因此，真正能够有所作为的文化政治批评应该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实践，它在催生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6) 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文化政治批评，由于明确的目的性而具有方法论的彻底开放性和真正多元性，它采用一切有效的话语形式和手段。

进入 90 年代以后，伊格尔顿的主要工作是娴熟地运用文化政治批评方法，以后现代主义批判为背景，在文学作品研究、文化现象分析、美学理论以及政治、伦理等诸多领域不断发出独特而不可忽视的声音。《理论的意味》(1990) 以及《后现代主义幻象》(1996) 表达了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立场。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在认识论上是片面的、简单的、绝对化的，是形而上学的翻版；在政治上是怯懦的、不负责任的，甚至是反动的。不过，有时候他也表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进行批判式对话的可能性。他在 90 年代出版的

另外两部重要著作是《美学意识形态》(1990)和《希斯科克利夫与爱尔兰大饥荒：爱尔兰文化研究》(1995)。在《美学意识形态》序言里，他声明要从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伦理规范等方面探讨现代欧洲的主要美学理论是如何为政治霸权服务的。资产阶级美学一开始就是为了服务于专制主义政治而对人的非理性身体进行理性的治理，但是也应该看到资产阶级在审美过程中追求的个人的充分自由实现具有革命的潜能。个人自由的完全实现是所有人自由实现自我的前提条件，这一美好的憧憬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男男女女们奋起改变世界。虽然作者无意撰写一部“美学史”，但是他从美学始祖亚历山大·鲍姆嘉通开始，对夏夫兹伯里、伯克、康德、席勒、费希特、黑格尔、马克思、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现当代美学理论的精辟叙述和分析，足以使该书成为从文化政治角度诠释西方现当代美学历程的经典之作，文学研究者的必备之卷。《希斯科克利夫与爱尔兰大饥荒》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伊格尔顿文化政治批评方法的魅力。在这里，读者已经很难区分什么是文学文本，什么是历史叙述，什么是审美再现，什么是政治阐发，什么是批评，什么是修辞。伊格尔顿不容置疑地指出：“希斯科克利夫就是爱尔兰人，年代也没弄错！”此时，理论与创作之间的传统分界已经被历史与现在之间的强烈震荡所击碎。对于伊格尔顿而言，这样做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因为他有天主教爱尔兰人的血统，他提出民族主义虽然是一种异化的东西，但是消除这种异化的途径只能是穿过去，而不是绕过去。在他看来，在解构后现代主义以及更大叙事——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发挥独特而重要的

作用。

1.2 伊格尔顿的贡献

伊格尔顿的重要批评理论著作是从1976年开始面世的，第一部就是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在1981年出版的《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一书里，他将自己明确划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队列，^①因此他的理论成就和地位首先应该放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谱系中来衡量。

马克思主义美学是汇聚了众多批评理论家的劳动成果的思想集合，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史迄今展示了四种基本模式：人类学批评、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批评和经济批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批评以G. V. 普列汉诺夫、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以及厄内斯特·费歇尔等人为代表。这一派从生物基础、物质联系、社会进化的角度界定艺术的起源、功能和发展，他们提出的问题一般是：艺术在社会过程中的位置如何？审美能力的物质和生物基础是什么？艺术如何与神话、仪式、宗教和语言相联系？这种方法把艺术观念放在广阔宏大的社会物质过程之中，有助于破除唯心主义艺术观的神秘性，开拓了批评的视野，把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问题纳入文化大语境，但是它容易滑入实证主义、功能主义和生物主义，容易导致庸俗马克思主义。

^① 参见 *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 Verso, 1981, p. 96.

马克思主义政治批评是随着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斗争而出现的，以列宁和他的一批战友为代表。如果说对于普列汉诺夫等人来说，批评是一件思辨和学术的事情，那么现在对于列宁来说，文学批评是论战和干预的形式，应该宣传和弘扬党的文化政策，挫败对立派的政治倾向，赢得同路人和打败孟什维克分子。对于创造新制度的人民领袖们来说，现在不是批评家们坐下来仔细分辨和考订美学概念的时候，不是编写学院教科书的时候，也不是为普希金诗作中五光十色的象征手法作注解的时候。在这场前所未有的伟大运动中，在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激活的这个令人眩晕的文化实验时代，批评家应该跟上形势，为艺术家的实践提供语言技术和材料。这种模式后来演变成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然而，这种创作方法的“胜利”也标志着苏维埃官方文艺政策失去相当一批西方世界的共产党人和同路人的景仰和支持，伊格尔顿称之为“一个令人寒心的过程”。^①

这时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第三种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这种模式的重大特色是能够从艺术作品的肌质、句式、韵律、修辞、叙述角度、结构布局等“形式因素”中看到其中刻写的社会关系、权力结构等物质历史。卢卡契从资产阶级的小说叙述手法的演变看出历史的深层关系，本雅明从波德莱尔诗歌的感知策略中探查出巴黎众生的实际存在状况，戈德曼从拉辛和帕斯卡的作品里发掘出

^①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43页。